

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③

肖滨 主编

中大政治学评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③

中大政治学评论

肖 滨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大政治学评论/肖滨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12

(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

ISBN 7-218-04453-0

I. ①中…②中… II. 肖 III. 政治学—中山大学—论文集 IV. D0-53

责任编辑	辛朝毅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插 页	1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453-0/D-515
定 价	63.00 元 (全三册) 本册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属于中山大学部（教育部）省（广东省）共建高水平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和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项目（编号：011 - 315241）——政治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夏书章 王乐夫

编辑委员会成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 娟（美国） 郭巍青 郭小聪 郭正林
何包钢（澳大利亚） 何高潮 李连江（香港）
刘 恒 刘 星 刘小枫 马 骏 任剑涛
王绍光（香港） 王 欢（美国） 肖 滨 徐俊忠
徐忠明 张海清 郑永年（新加坡） 钟明华

总 序

如果把编撰、出版这套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视为我们的一种学术志业选择，那么，激励我们进行这一选择的理由有三：

其一，接续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行政学在中山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1924年孙中山先生手创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时，即将1905年广东开办的法政学堂纳入其中，并设立政治学系，这一学科建制直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才告中断。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大担任教职的不仅有著名政治学家萨孟武、邓初民和著名政治哲学家、宪法学家张君勱先生等人，而且有不少默默耕耘的政治学、行政学教授。在一份由中山大学校史资料室提供的民国21年（1932年）至民国24年（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教职员名录的资料上，我们就发现了一些政治学、行政学前辈的名字，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胪列其中几位：

——邓孝思，政治学系主任、教授，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政治学说、政治学史。

——詹显哲，政治学系教授，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兼政治经济科，主要从事国家学、国际政治、政治史的研究。

——刘永南，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毕业，主要从事各国政党论、地方自治的研究。

——邱昌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宪法、地方自治的研究，著有《议会制度》、《地方自治》等。

——范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主要从事宪法、行政

法的研究。

——梁贞，法国国立第戎大学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宪政学、行政学、民族运动史的研究。

——胡汉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地方自治、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梁朝威，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现代政治思潮的研究。

——蒋竹林，美国密歇根大学市政管理学硕士、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各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

以上只是从一份简略的档案资料上获取的信息。不过，由此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进行仔细的收集、发掘和整理，一定可以再现出一个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那将是一个浸透了前辈学子心血的历史传统。可惜，这一传统因1952年全国的院系调整而随风飘散。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老一辈著名政治学与行政学家夏书章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在王乐夫教授的领导与努力之下，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才得以获得恢复、重建，并获得较大的发展。

在走向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先前学者努力的基础上，延续学科的历史传统，承接前辈学人的学术风范，是值得后生学子不断思考与实践的大问题。本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可以视为我们对此问题交出的一份远远没有结束的答卷。

其二、推进政治学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增长。

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也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对政治漫长的经验和长期的思索中，逐步形成了一门被称之为“政治学”的知识系统或者说一门科学：“在‘科学’一词的广义上，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掌握和组织的信息和理论是知识。这种知识既是真实的又是有用的。这种知识也

是积累而成的。”^①

正视或者面对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我们确实需要反对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古人对它无所不知，我们只能借助和吸取他们的智慧；第二，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惟一方法是摆脱过去的羁绊；第三，政治学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知识，它纯粹是本土经验积累的产物。这三种观点之所以不能接受在于：第一种观点封杀了政治科学知识增长和知识创新的必要性，意味着政治科学知识之树再也不结新果；第二种观点破坏了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和连续性，其结果是政治科学知识之树的根被彻底挖断；第三种观点否定了政治科学知识跨国界交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使政治科学知识之果沦落为不能进行国际交流的“土特产”，从而最终失去知识的价值和品格。毫无疑问，对政治科学知识系统的发展而言，这三种局面都是灾难性的。

因此，如何借助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活动和知识交流，建立起政治学科的国际标准和全球视野，同时，通过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总结，推动政治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增长，使政治科学这棵知识之树在中国的学术园林中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是从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本论丛的编撰、出版即是希望为此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其三，为中国政治趋向法治民主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政治学的支持。

一百多年前，目睹 19 世纪时代巨变的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不朽的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绪论中断言：“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他确信，这将导致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面对这一变革，他提出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然而，托克维尔忧虑的是，“我们却很少这样想过。我们被投于一条大江的急流，

① [美]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竺乾威等译，王沪宁校，《政治学手册》（上卷），第 141 页，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冒出头来望着岸上依稀可见的残垣破壁，但惊涛又把我们卷了进去，推回深渊。”在托克维尔看来，走出这种深渊，需要一种政治知识系统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呼吁：“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①

显然，如果把这一呼吁运用于当代中国，那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社会，或者说引向一种新的政治文明。而全新的社会或者新的政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不仅为我们奉献一种法治、宪政、民主、共和的政治理论，而且为中国政治实现向法治民主的转型、走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智慧资源和操作技术。确立这样一门政治科学无疑是从事政治学教学、研究的学者们一种历史性的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可能需要许多代人持久而坚韧的努力。编撰、出版这一套政治学论丛正是我们做出这种努力的第一步，虽然是极小的一步。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把本论丛的编撰、出版视为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定位为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因此，在整体布局上，本论丛将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论著系列。具体包括学术论文集、政治学评论和学术专著。二是教材系列。三是译著系列。在操作方式上，我们将采取渐次推进、积少成多的策略，以期通过长期的努力实现规模效益。

我们渴望同行专家的批评。

我们期待读者朋友的指正。

我们企盼得到大家的呵护与支持

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2003 年 11 月

①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 4、8、9 页，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目 录

专题论文

论自由主义的成长

——汉语语境中的论说……………任剑涛 (1)

收入生产、交易费用与宪政体制……………马 骏 (58)

大国何以共和？

——以詹姆斯·麦迪逊的宪政设计思想为例

……………刘 淳 (83)

选举与公共空间

——2003 年“深圳竞选”的一种解读……………郭巍青 (147)

农民与公民：广东农村政治文化转型研究……………李大华 (163)

学术评论

当前中国农村政治研究述评……………郭正林 (195)

政治发展中知识与实践的制度基础……………毛寿龙 (226)

组织间网络理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新视野……………张紧跟 (252)

学人对话

多元社会及其敌人

——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与自由主义

……………以赛雅·伯林 斯提芬·路克斯 (270)

“群己权界”三原则与特定情境下的公域/私域之分

——关于公民权、共同底线与“低调社会民

主”的讨论……………秦晖 杨支柱 (304)

国际视野

全球一体化、美洲自由贸易区、与亚太地区经济安全

——兼论二十一世纪中美日三边关系……………熊 玠 (330)

“红色三翼”：东欧左派走进二十一世纪……………金 雁 (353)

学术书评

比较政治学理论的清理与新范式的构建

——奇尔科特姊妹作读书笔记……………张海清 (387)

帝国时代的政治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重述

……………洪 涛 (404)

论自由主义的成长

——汉语语境中的论说

任剑涛

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状况来看，相比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而言，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的关联性，显得更为紧密。因此，哈耶克曾经强调，“自由理想发起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亦使得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①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自由主义的成长与现代社会的成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问题。而且，虽然自由主义是在现代社会的孪生过程中发育的，但是，自由主义的成长，却与现代社会所需的自由主义精神支持程度强弱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如何使自由主义在学理上更成熟、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更健全，关系到现代社会持续发展的深厚精神动力问题。这一点，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中已经获得验证。而就我们所处的实际生活环境讲，自由主义的成长历来不顺。这与“现代”社会在中国的生长不顺，相映成趣。为此，以汉语文化语境为背景，讨论自由主义的成长，就成为当下正努力建设“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应予重视的、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

①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第2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一、主义与问题的脱节

从原发自生的角度讲，汉语文化语境没有发育出自由主义。^①西方文化语境中滋生和发育出的自由主义进入汉语文化语境之后，在思想文化界还经过一段时间的冷落。这一阶段，大致是严复致力引介自由主义，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一书时期。虽说严复的翻译活动在整个思想文化界引起过较大震动，但他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译介，反倒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虽说这在中西文化理念的传通史上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就严复对自由主义的把握与理解来讲，作为一个中国文化背景的学人最初接触自由主义，严复准确地抓住了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即自由主义就是要划分清楚“群己权界”。在严复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声音比较弱小。激进主义思潮与保守主义思潮交相冲击人们的思维神经。激进主义依托于民族救亡日益取得文化霸权地位。保守主义则依托于民族价值自存的信念，占据了相当大的思想活动舞台。而自由主义在激烈的救亡运动中难以发挥什么大的作用，更无法用以鼓舞民气。因而，自由主义的思想活力，在其甫入中国之际未能显现而出。这一方面说明了自由主义与当时中国社会所需的疏离，限制了它获得其生长所必需的社会土壤。另一方面，也预示了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处于紧张状态，从而限制了它获得生长所必须的宽松思想文化环境。

以“五四”为契机，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生长状况略有改观。把“五四”作为一个观察时代思潮的整体现象，其精神基础大致上说是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如果说激进主义在“五四”的

① 参见任剑涛：《自由主义的两种理路：儒家自由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原道》第四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社会行动方面起了主要推动作用的话，那么，自由主义在“五四”的基本理念表达方面则具有更积极的作用。只是在“五四”的时代背景下，自由主义之作为“主义”的完整性意义才显示出来。所谓“主义”的完整性，大致是指一种主义在理论的结构上，它所建立起的基本立场，与它注定的社会政经制度建构和生活方式，能相互呼应。而它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往上行，它足以提升社会大众的朴素愿望为一较为严谨的理论；往下行，它足以从社会基层析取到自身发育壮大的丰富营养。换言之，理论与现实是胶合在一起的。“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是作为最规范意义上的代表登台的，而已经显现出激进主义倾向的李大钊、陈独秀也发表了自由主义立场较为鲜明的言论。他们三人的言论，大致已将自由主义的“主义”内容揭示于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问题针对性作了分析。把三人的思想综合起来看，理论上，关涉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都已被三人所顾及。诸如自由主义的涵义、自由与人权、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宪政、法治、自由主义与政体、政党政治等等。就自由主义的实际问题针对性讲，三人也对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自由主义与革命等问题作了讨论。

就自由主义的基本涵义而言，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做了概括，“立宪政治基于自由之理”，“顾自由之保障，不仅系于法制之精神，而尤需乎舆论之价值。故凡立宪国民，对于思想言论自由之要求，固在得法制之保障，然其言论本身之涵养，尤为运用自由所必需。”^①总之，自由的政治以民彝为本。言论自由之作为自由主义的重要涵义，在此得到强调。而自由主义与宪政、法制的紧密关联性，在此得到暗示。“无自由则无生存之

① 《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价值”。^①自由对人类生存、社会健全的重要意义，在此得到凸显。而胡适在此后的一系列名篇，诸如《人权与约法》、《民权的保障》、《汪蒋通电中提起的自由》、《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自由主义》等等文章中，广泛申诉了自由主义的理论要点。陈独秀则在《为自由而战》、《法律与言论自由》、《宪法与孔教》、《政治的觉悟》等篇章中，亦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原则做了阐述。这些文章，虽然在时限上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四”作品，但是作为作者“五四”思想的表达则是没有疑问的。三人的这些著述，对于自由主义的诸蕴涵，如身体自由、财产自由、家宅自由、书信秘密自由、出版自由、教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均有涉及。^②其中，尤以胡适的《自由主义》一文对这一时期的自由论说做了归纳。这一归纳可以称为胡适的自由四要义论：一是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其余三者是民主、容忍、和平改革，“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方面”。至于和平改革，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和平的转移政权，二是以立法改革求点滴进步。^③胡适的归纳，在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史上，应当说是超迈前人的。

另一方面，“五四”一辈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应当说有一种自觉的认识。他们通过三种途径来直陈自由主义的现实功用。一是对时局发表评论的方式；二是通过对自己政治主张的陈述来表达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三是以其对“中国问题”的诊断来凸显自由主义的现实有效性。他们能

① 《李大钊文集》上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李大钊文集》上卷，第244—25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430—43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够具有这种以某种理论诊治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自然与他们对理论本身的把握有关。同时，也与他们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诸种现实问题中最紧要问题的判断有关。直接就他们对自由主义现实功用的发挥而言，他们所采用的三种方式，对时局的评论具有情景针对性，大致只限于表现其自由主义立场的意义上面。而通过对政治主张的陈述，则明确表现出他们自觉的政治理念。这一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声明式的文字，出自一批有着自觉的自由主义政治要求的学者之手。中心意思是陈述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低限度的目标——关于“好政府”的政治主张。除开具体的政治意见外，“好政府”的政治主张包含对“好政府”涵义及政治改革基本原则的要求。“好政府”的消极涵义是防止公共权力用于私人目的；积极涵义是以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福利、充分容纳个人自由与爱护个性发展。与此相关的政治改革基本要求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①这一声明，说其代表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要求，是恰如其分的。对比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形，一方面，政治问题的紧要性显然在所有其他问题之上，因而，自由主义者们抓住政治问题来表白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是有现实理据的；同时，当时中国政坛人物的行为，“好政府”的吁求也是对治现实政治弊病的一种有意识的主张。而且，这一吁求，与自由主义者对“中国问题”的症结的见解，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眼里，政治问题是中国社会最紧要的问题。因此，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中，政治自由主义（甚至更宽泛的文化自由主义）才是以解决“中国问题”。平心而论，这种主张出自于当时局面的影响，任何论者也难免不把政治问题从所有问题中抽取出来加以强调。自由主义之理论性的“主义”与其所对治的现实“问题”，在政治层面上“对接”

①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187—18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起来。

似乎自由主义就此获得了在中国生长的各种条件了？其实尚未。究其原因，一者是因为与自由主义原生地——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发育、生长的状况，相去甚远。脱离开原生情形来看后发的、异域国家自由主义的发育、生长，要么前者不具有典范性，要么后者就必须具有独创性。但是，前者的典范性是一个经验事实，后者的习得性则远在创新性之上。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中国自由主义者思路的歧向了。二者，当时中国社会之迈向“现代”的关键究竟在于政治上的改革，还是经济上的突破——突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进入市场经济境地，是决定自由主义者以政治改革作为自由主义成长的优先条件之合理性判断的标准。设定经济的因素对社会变迁具有更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自由主义者把政治放到优先的位置，也就值得商榷了。

就前一方面来说，西方社会里自由主义的发育生长，与近代西方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紧密相关。以哈耶克对自由主义成长过程的考察，这一过程的理论概观为：

我们对周围的环境大多是一无所知，它们产生的结果也不符合我们的意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诸如市场交换中价格体系一类事物的引导下，我们为人行事、谋求生存。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既不知道要满足什么需要，又不知道从何处满足所需。我们为人们服务，然后却几乎不认识服务的对象，甚至不知道世间还有这些人；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别人的服务，对于这些为我们服务的人，我们也是一无所知。这一切全都可能发生，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制度和传统构成的巨大框架之中。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制度和传统构成这种框架，我们通过对某些行为准则的遵循取得与它的适应；这些准则并不是我们制定的，如果说我们理解自